

崔東壁遺書

上

〔清〕崔述 撰著

顧頡剛 編訂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崔東壁遺書

上

〔清〕崔述 撰著
顧頡剛 編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崔東壁遺書 / (清)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25-6864-2

I. ①崔… II. ①崔…②顧… III. ①史評—中國—
三代時期 IV. ①K221. 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24466 號

崔東壁遺書

(全二冊)

[清]崔述 撰著

顧頡剛 編訂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80.75 插頁 1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50

ISBN 978-7-5325-6864-2

K·1737 精裝定價: 2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

重印瑣記

崔東壁遺書的顧頡剛先生編訂本，一九三六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後，過了四十七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轉瞬又是整整三十年過去了。現在連舊書店裏也很難見到了。出版社爲了適應新一代學者的需要，並紀念顧先生誕生一百二十周年，又要重印此書，這是令人欣喜的。看來崔東壁的這部有價值的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埋沒了一百多年之後，經過上世紀胡適、錢玄同和顧頡剛等先生的表彰，加以顧頡剛先生認真、嚴肅、細緻的編訂，今後有希望在出版社不斷地重印下永遠流傳下去了。

一九八一年，我爲顧先生續補此書的長序，其中標點問題一節，有兩件事因沒有看到材料而遺漏了，現在就把它們補在這裏。

一是顧頡剛先生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說：

肖甫作封氏聞見序，其論標點全襲予說（崔東壁遺書序），其作書序辨序，論書序非西漢古文家物亦襲予說，而皆不聲明，我現在要作崔東壁遺書序反而不能用了。

我爲顧先生續成的崔序，這一節用的都是顧先生的原稿，當時沒有看到這段日記，加以說明。爲了不使後人看到兩者說法相同而產生懷疑，花費時間去作不必要的查考，就把這段日記摘錄在這裏，作爲見證。

二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出版的史學雜誌創刊號上刊有顧先生的一篇關於標點的札記，其中所談標點的史事，可補標點問題之缺，全文僅三百字，就附錄在後面。

標 點

「標點」一詞似爲適之先生所創。五四運動後，汪原放君點諸舊小說，適之先生序之以行，廣告上顏之曰「新式標點」，此詞遂確立矣。盧南嶠君語予曰：「此詞宋代已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儒林何基傳曰：『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又同卷王柏傳曰：「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皆是也。」讀此，可見讀書而加標點，自是金華學派治學方法。其後明人刻書，遂多塗附，匪特便初學，更使義顯意明，不待論說而自見也。惟評文之家，濃圈密點，流於惡濫。清人起而糾之，行格間掃除清白，舍綱鑑及小說、墨卷外，殆無有附刻標點者，此則矯枉過正，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者也。

王煦華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

附記：

此次重印，出版社未及重排，茲將需要增訂之處附載於次。

崔東壁遺書序

第一頁上倒第三行 第十二字「在」後增「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的」。

第一八頁下第九行 「大寶玉白」下加「郊牲，白，」。

第一八頁下第十行 「祭牲」下「日」改「白」，「尚」字下「肝」改「肺」。

第二一頁下第五行 第五字「乃」改爲「及」字。

第二八頁上第六行 第八字「稱」下加「之」字。

第三五頁下第七行 末二字「鄭玄」，書名綫改爲專名綫。

第三六頁上第十六行 第五、六兩字「金錢」改爲「賞賜」。

第三八頁上倒第二行 倒第七字「他」刪去。

第三九頁上倒第五行 「獨抱遺經究終始」下增「（寄廬全）」小字

注，「識古書之真偽」下增「（答李詡書）」小字注。

第四三頁下倒第四行 倒第三字「也」改爲「又」。

第五一頁下第十二行 小字注「卷三十七」下逗號改爲頓號。

第六六頁下第七行 第一字「監」改爲「開」。

第六六頁下第七行 末尾「蜀中字本」下逗號改爲頓號。

細目

第二九頁下第一七行 「父辛」，「辛」改爲「卒」。

第四四頁下倒二行 該行前應增補「嘉慶八年，癸亥（一八〇三）

移居西山孟村 六四歲 一〇〇二二一行。

崔東壁遺書總目

崔東壁遺書序	一七一
崔東壁遺書細目	一四六
考信錄提要二卷	一
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二五
以上前錄二種	
唐虞考信錄四卷	五一
夏考信錄二卷	一〇七
商考信錄二卷	一二九
豐鎬考信錄八卷	一六一
洙泗考信錄四卷	二六一
以上正錄五種	
豐鎬考信別錄三卷	三七
洙泗考信餘錄三卷	三六三
孟子事實錄二卷	四〇九
考古續說	四三九
考信附錄二卷	四六五
以上後錄五種	
王政三大典考三卷	四八九

三代正朔通考	四八九
經傳禘祀通考	四九六
三代經界通考	五一三
讀風偶識四卷	五二三
古文尚書辨僞二卷	五七九
論語餘說一卷	六〇九
以上翼錄四種	
五服異同彙考三卷	六二三
易卦圖說一卷	六六七
以上雜著二種	
無聞集四卷	六八三
以上文集一種	
崔東壁先生佚文	七二七
知非集	七四七
二餘集	七八一
針餘吟稿	七九一
菽田膳筆殘稿	七九九
附編	
崔德皋先生遺書四種	八一七
訥菴筆談二卷	八二〇
尙友堂文集二卷	八三三

尙友堂說詩一卷·····八六二

寸心知詩集二卷·····八六六

附錄

序目·····九二一

傳狀·····九三九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九五〇

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一〇一〇

關於本書的評論·····一〇四〇

崔東壁遺書名目索引·····一一七六

崔東壁遺書序

顧頡剛

前記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在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一文的「附言」裏曾說過：

去年春夏間，逼着自己做一篇序文，要把二三千年中造偽和辨偽的兩種對抗的勢力作一度鳥瞰，使讀者明白東壁先生在辨偽史中的地位，從此明白我們今日所應負的責任。不幸人事太多，找不到整段的時間作此長文，旋作旋輟，只寫成了戰國、秦、漢間的一段，而很重要的識緯則尚未敍及（在這一年中，必作為專文發表。）……承史學年報索稿，因把此序略加修飾，易為本題發表。將來倘有時間，許我續作，那麼這篇「造偽和辨偽史」自必做完。因為漢以下的材料我已收集了些，其中的問題不多，只要有時間總是可以寫下去的。

這是四十五年前我為續作崔東壁遺書序許下的願言，可是在這樣漫長的時間裏，竟一直沒有空閒和機會來了却這一心願。一九七五年五月，翻閱以前的日記，在日記中又寫了一段「附記」，說明我當時的感慨。

崔東壁遺書序，雖寫得已不少，終以事冗未能寫完，其後改

題為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交燕大史學年報發表，實半篇耳。予是時社會關係已多，不可能如初入燕京時之專心，予之性格，青年之趨附，時代之動盪，三者各有其阻力，而壯年之光陰已去，勢不許其如願，思之憤懣！

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要重新排印這部書了，這就又逼着我非把這篇序文繼續寫完不可。經過了四十五年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仍能在我有生之年裏，在我的學生王煦華同志協助下，完成這篇前幾年認為不可能寫完的文章，心裏格外感到高興。我深信後來的學者一定會把古史的考辨工作繼續做下去，終有一天會把偽古史和真古史區別得清清楚楚。這篇序文既是賡續前作，所以漢以前的部份就仍沿用原文，只作了少許文字上的修改。漢以後的部份，則是根據以前的草稿，加以補充修改的。

（一）古人缺乏歷史觀念

研究歷史，第一步工作是審查史料。有了正確的史料做基礎，方可希望有正確的歷史著作出現。史料很多，大概可以分成三類：一類是實物，一類是記載，再有一類是傳說。這三類裏，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於此而可用於彼的。作嚴密的審查，不

使它僭冒，也不使它冤枉，這便是我們研究歷史學的人的任務。

所謂僞，固有所謂的作僞，但也有無意的成僞。我們知道作僞和成僞都有他們的環境的誘惑和壓迫，所以只須認清他們的環境，辨僞的工作便已做了一半。

我們研究學問的先決問題，第一是瞭解從前人的工作的結果，第二是認識我們今日所負的責任。現在許多人都在研究中國史，而中國的史料不可信的甚多，尤其是古史，又不曾經過整部的嚴密的審查，其中待我們努力解決的問題不知有多少。爲了鼓勵大家的工作興趣，擔負起時代所賦予的責任，所以我略略搜集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的事實，作成這一篇，希望讀者認識這兩種對抗的勢力，以及批評精神與辨僞工作的演進，好藉此明白自己所應處的地位。

在述說這問題之前，我們該得知道，所謂「歷史觀念」，在現在看來雖是很平常的一種心理，但其發展的艱難却遠過於我們的想像。「致用觀念」，在石器時代已有了，否則人類就不會製造出這些器具。這個觀念從此發達下去，成就了今日的精緻和奇偉的物質文明。但歷史觀念超出現實，它的利益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所以非文化開展到了相當程度，決不會存在於人們的頭腦裏。將來不可知；截至現在止，它還只限於少數人的使用。古代當然更不必說。這少數人既已有了這個觀念，一定忍不住，要發之於言行；然而敵不過多數人的懵懂，於是終被他們的宗教信仰或致用觀念所

打倒。這是無可奈何的悲劇！若要這種悲劇不發生，只有兩條路。其一，大家達到一件事情，就肯想一想，不儘跟人家跑。其二，看到不如己意的議論和著作肯寬容，不要黨同伐異。能够這樣，歷史觀念的發達自然一日千里，而無用之用也定必超過致用觀念所收穫的實惠了。

只爲古人缺乏歷史觀念，所以最不爱惜史料；因而寫不成一部可靠的歷史。很古的時代如何，我們的智識不够，無從提起。且從武王克商說起罷。當他成功之後，史記上說他「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周本紀），逸周書上說他「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以及麋、鹿、羆、豕等約一萬頭（世俘），他掠奪的只是些鼎彝、寶玉、牲畜，而不是殷商的歷史材料。固然，這種傳記百家之言也許是靠不住的，武王也許肯不注重實利；可是現有的證據已足夠證明這些記載了。安陽的殷墟，在三十年中發現了四五萬片的甲骨卜辭，以後經中央研究院大舉發掘，連宗廟宮室陵墓的遺址也找出來了。然而地下挖出的遺物只有大量的甲骨和瓦片，而銅器和玉器乃至。這不是銅器和玉器已被搶光了嗎？因爲周人有致用觀念，所以把凡是值錢的東西都帶走了。又因爲他們沒有歷史觀念，所以想不到開辦一個「故宮博物院」。他們看盤庚以來二百餘年卜用的甲骨，正如我們看一大堆廢紙似的。說到這兒，真令我暗暗地叫一聲慚愧。十餘年前，北京的歷史博物館嫌明清內閣大庫的檔案堆積得太多了，又

占房屋，又費功夫，覺得討厭，所以就把它其中不整齊的裝了八千麻袋，賣給紙廠，作爲造還魂紙的原料。司法部中藏有明朝的刑部老檔，總長朱深看它是過時貨，下令燒了。七年前，國都南遷，蒙藏院的檔案無人保管，全數散出，賣給攤販包花生糖果。究竟甲骨的用處不如紙張，不能製造還魂紙，也不能包裹糖果，周武王覺得不能獲利，扔下了。後來康叔封于衛，他也許嫌這種東西討厭，但它又不像紙張的容易燒毀，只得留下了。誰想過了三千年，這種廢紙竟沾了人們的歷史觀念的光，忽然發生了用處，害得許多考古家和古董商費了全副的精力去搜求，騰起很高的行市！又誰想現在人們的歷史觀念，只會應用於數千年前的檔案（甲骨），而不會應用於數百年中的檔案！唉，人類的進步是這樣慢的。

因爲古人太沒有歷史觀念了，所以中國號稱有五千年的歷史，但只賸下微乎其微的史料。現在再講一個故事，曹植做了鄆城侯，那邊有一座舊殿，是漢武帝的行宮，他拆毀了。因爲有人假借了神話來反對，他就下令道：

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隻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燬……況漢氏絕業，大魏龍興，隻人尺土非復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爲魏之東京，故夷朱雀而樹閭闔，平建陽而建泰極。況下縣腐殿，爲狐狸之窟藏者乎！……（文館詞林六九五引）

他的話說得多麼爽快，有了新朝就該把舊朝的東西完全摧毀了！看了這文，誰還敢說中國人好古！在這種觀念之下，只有時行的留存與不時行的銷滅兩件事。然而不幸，歷史所記是十分之九屬於不時行的呵！

凡是沒有史料做基礎的歷史，當然只得收容許多傳說。這種傳說有真的，也有假的；會自由流行，也會自由改變。改變的緣故，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國的歷史，就結集於這樣的交互錯綜的狀態之中。你說它是假的罷，別人就會舉出真的來塞住你的嘴。你說它是某種主義家的宣傳罷，別人也會從這些話中找出不宣傳的證據。你說它都是真的罷，只要你有點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責備。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們的真或假罷，古代的史料傳下來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較的工作。所以，這是研究歷史者所不能不過而又極不易過的一個難關。既經研究了歷史，誰不希望得到真實？既經做了研究工作，誰不希望早日完工？可是古人給我們的難題太多了，這個回答不好的責任是應當由古人擔負的，我們只有使盡自己的力量以求無愧於心而已。

（二）戰國、秦、漢間好古者的造僞

我們在前面既知道古人沒有歷史觀念，不愛惜史料了，但從別方面看，則中國民族又有一種癖性，是喜歡保留古代的語言方式。我們現在尙關白話與文言之爭，好古者還想拿公元前數百年的白

話作爲二十世紀的通用文字。古代也是如此。我們在左傳裏讀到周王的說話，就知道他和春秋時一般人的口語有別。例如僖十二年，齊桓公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說：

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又如哀十六年，衛莊公使鄢武子告嗣位於周，王說：

朕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雖然文氣卑弱，必不能像殷、周間文字的樸茂，但春秋時有摹倣古文字的風氣，即此可以推知。文既倣古，當然有偽造古書的。孟子萬章篇上有一段話：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此文易「謨」爲「謨」，易「皆」爲「咸」，易「功」爲「績」，又省去許多動詞，如「牛羊父母」，「舜在牀琴」等句，顯見作者要表示其爲唐、虞的真傳，故有意不循戰國的語法。其他孟子中所引堯、舜事，又有「祇載見瞽瞍」，「瞽瞍底豫」，「舜尙見帝」等句，也都用了古字易去今字。在這種空氣之下，帝典就出現了，邃古的名人也都有著作傳下來了。作者沒有新發見的史料，也沒有時代的觀念，只憑了個人的腦子去想，而且用了貌似古人的文體寫出，拿來欺騙世人。戰國、

秦、漢之間，這種東西不知出了多少。其後賴倣古而成名的甚多，揚雄的太玄和法言最能表現這個特徵。又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把「揆其所始，至於所終」寫作「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把「大道於是成」寫作「大行越成」，把「深恩廣大」寫作「湛恩厯鴻」，把「化蠻夷爲文明」寫作「晦昧昭晰」，簡直不講文法，專堆生字，到了畫符念咒的地步。

他們既已爲了沒有歷史觀念，失去許多好史料，又爲了沒有歷史觀念，喜歡用古文字來作文，引出許多偽書。在這雙重的搗亂之下，弄得中國的古書和古史觸處成了問題。從前君主時代，君主的權力的基礎建築在經書上，於是「非聖無法」可以判死罪（例如嵇康以「非毀典謨」而受誅），大家死心塌地，不敢去想，倒也罷了。現在呢，君主是倒了。從前人沒有學術史的眼光，以爲最古的人是最聰明的（例如黃帝發明了幾十種東西，做了幾百卷書），什麼事情都是老早就規定妥當，不必由我們去想，倒也罷了。現在呢，知道智識由於積累，後人的本分是應追過前人了。我們在這種環境之下，哪能不起來問，哪能不起來幹。如果不這樣，我們簡直辜負了這時代。何況，在從前極束縛的環境之下，尙有起來問，起來幹的，我們如果在這大解放的日子裏還作無懷、葛天之民，試問有什麼面目對着他們？

（三）孔子對於歷史的見解

中國的文化中心，大家都知道是六經和孔子。六經的問題復

雜，我們先來看孔子。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是有史以來第一部私家著作。我們可以在論語中看出孔子對於歷史的見解。

孔子雖是儒家的開創者，但這原是後來的儒家推尊他為始祖而已，他並沒有創立一種主義，也沒有定出什麼具體的政治計畫來。他雖常提起夏、殷，但夏、殷的歷史差不多沒有說到。八佾篇云：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他說夏、殷之禮的「不足徵」由於他們後裔杞、宋二國的「文獻不足」，似乎很能注意到史料上。但為什麼對於夏、殷之禮又兩云「吾能言之」呢？既已沒有史料，他怎麼去講歷史呢？這不使人疑惑？由我猜想，恐怕那時人對於夏、殷的故事都隨便說，孔子也不能免。所謂「不足徵」的，是史料。所謂「吾能言之」的，是傳說。照這樣講，孔子口裏的夏、殷之禮就有問題了。

他又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衛靈公）又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在這兩句話裏，可見他的心目中的夏、殷的禮對於周代人的效用只在「留備擇取」的一點。他只拿了致用觀念來看夏、殷，而不拿歷史觀念來看夏、殷，這個意思表示得非常清楚。（要是他用了我們的態度，就得問：「夏、殷的禮究竟是怎樣的？」）

「夏、殷的禮是怎樣構成的？」（夏、殷的禮在我們這個時代裏有什麼實用價值？）在這種觀念之下，與周有關的尚可僅憑傳說，而與周無關的自然更不妨讓它漸滅了。

制度既已只備擇取，史事當然只備勸懲。在論語裏，可以看出孔子和弟子們說話時稱引的人，只是把人類的性質品行分成數類，每類舉出幾個最有力量的代表。例如做人君的要無為如堯、舜，勤儉如禹、稷，知人如舜、湯；做人臣的，要能幹如周公、管仲，忠直如史魚、柳下惠，識見如伯夷、蘧伯玉。他提起古人，不是傳授歷史知識，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這種觀念原是當時人所通有的。因為日久流行在口頭的緣故，所以好人會儘量好，壞人會儘量壞。其實豈但當時人，就是現在，除掉研究歷史的專家以外，提到古人，誰不只記得幾個特別好的和特別壞的。你隨便走進一個戲園或評書館，就可以聽得能幹的姜太公和諸葛亮，勇敢的薛仁貴和楊繼業，奸詐的曹操和秦檜，方正的包龍圖和海瑞，以及武松、黃天霸等義士，李太白、唐伯虎等才子，楊貴妃、崔鶯鶯等美人，姐己精、潘金蓮等淫婦。這些演員和聽衆，並不要求知道這班古人的年代先後和他們的特殊的環境，只覺得古來的人，或善或惡，其翹然特出於人羣的不過這幾個而已。有了這幾個，他們說話或唱戲時就儘够引用了，要尋一個人物作自己的模範時也有所取資了。當時子貢究竟是一個智識分子，他聽了抑揚過甚的傳說不免引起了懷疑。他道：「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張）這句話的反面，就是說，「周公之才之美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居上流者，天下之善皆歸焉」。也就是說，「中流者非無善惡也，天下之善惡皆不歸焉」。這實在是一句聰明話，是我們的辨偽史中的第一

句話。

古時只有代表人物而沒有史。今日則既有留存於民衆心目間的代表人物，又有爲學者們所保存研究的歷史材料。這是古今的一大區別。古時雖以孔子之聖知，也曾起過「文獻不足」的感歎，但究竟受時代的束縛，惟有宛轉牽就於致用的觀念之下而已。

(四) 戰國以前的古史是「民神雜糅」的傳說

孔子的思想最爲平實，他不願講「怪，力，亂，神」，所以我們翻開論語來，除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二語以外，毫無神話色彩（這二語本是很可疑的）。其實那時的社會最多神話。試看左傳，神降於莘，賜虢公土田（莊三十二年），太子申生縊死之後，狐突白日見他（僖十年），河神向楚子玉強索瓊弁玉纓（僖二十八年），夏后相奪衛康叔之享（僖三十一年），真可謂「民神雜糅」。歷史傳說是社會情狀的反映，所以那時的古史可以斷定一半是神話，可惜沒有系統的著作流傳下來。流傳下來的，以楚辭中的天問爲最能表現那時人的歷史觀，但已是戰國初期的了。（此文必非屈原著）

天問是一篇史詩，用了一百八十餘個問題來敘述當時所有的上下古今的智識。篇中先問宇宙的着落，再問日月的運行，這就是所謂開闢的故事。於是問到人了，第一個是鯀，問他爲什麼治洪水時要聽鵩龜的話，爲什麼上帝把他永遠監禁在羽山。第二個就是禹，問他在極深的洪水中怎樣的填起土來，應龍又怎樣的幫他治

水。第三個是康回，就是共工，問他怎樣一怒，土地就塌陷了東南一角。於是問到地方：東西南北哪邊長，太陽哪裏照不到，崑崙、黑水在何方。從此順了次序問起夏、商、周的歷史故事，其中也很多大可怪異的傳說，爲儒家的典籍裏所沒有的。

在天問中，禹是一個上天下地，移山倒海的神人，鯀是給上帝禁壓在山裏的。洪水是開闢時所有；平治水土不是人的力量，乃是神和怪物合作的成績。有了這個瞭解，再去看詩、書，那麼，玄鳥生商的故事，履帝武生稷的故事，「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句，「鰥於羽山」之文，均不必曲爲解釋而自然發現了它們的真相。

不但如此。史記秦本紀說秦祖女修吞卵生子，中行鳥身人言，也可信爲當時確有的史說。山經記陝西西部至甘肅一帶是一個上帝的國家，而黃帝便是那邊的上帝，即此可知秦祀黃帝的緣故，又可知黃帝陵所以在橋山的緣故。其它如書中的「高宗彤日，越有雉雉」，金縢的「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以及趙世家中的秦識，大宛列傳中的禹本紀，拿那時人的眼光看來，正是家常便飯，無所用其疑怪。

我們可以說：在戰國以前，古史的性質是宗教的，其主要的論題是奇蹟說。我們不能爲了孔子等少數人的清澈的理性，便把那時的真相埋沒了。

(五) 墨子的託古

到了戰國，情形就大變。戰國以前整個社會建築在世官制度上。左傳上說「人有十等」(昭十年)，士以上爲四等，皂以下爲六等，爲的是要使他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桓二年)。但後來因交通的便利，商業的發達，庶民就有了獨立的地位。又因諸侯的吞併，地力的開發，大國益增富強，管理國家的事不是幾個精神衰老過慣舒服日子的世家大族所能爲，庶民中的賢者就起而擠倒了世官。大家要奪政權，就大家要有智識。這樣的社會組織的大變動，當然對於思想學術有劇烈的影響，古史傳說遂更換了一種面目。

學術界中第一個起來順應時勢的，是墨子。他有堅定的主義，有具體的政治主張。他的第一個主張是「尚賢」，他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他的第二個主張是「尚同」，他說：「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這樣說來，一切世官等級，他們是準備全部打倒的；誰有本領誰做官，哪一個最有本領就請哪一個做天子。這等堅決的主張當然會博得民衆的多數同情，所以就是和他勢不兩立的儒家，也不能不採取他的學說。大學裏說的「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中庸裏說的「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及堯典的「克明峻德」一章，皋陶謨的「日宣三德」一章，都是儒家承受墨家學說的證據。

但當時人最沒有時代的自覺，他們不肯說「現在的社會這樣，

所以我們要這樣」；只肯說「古時的社會本來是這樣的，所以我們要恢復古代的原樣」。然而，戰國的時勢是從古未有的創局，如何在古代找出相同的事例來呢？這在我們研究歷史的人看來，是絕對沒有辦法的事。但他們有小說家創作的手腕，有外交家說謊的天才，所以容易得很。他們說：舜是從畎畝之中舉起來的，伊尹是從庖廚之中拔出來的，傳說是從版築之間解放出來的，膠鬲是從魚鹽的商場中挑選得來的，所以農夫也可以做天子，廚子、囚徒、魚販們也可以做大臣。他們又說：堯把天子讓與舜，舜把天子傳與禹，所以天子之位不是世襲的，一個天子老了就應當在他的臣民中選擇一個最有本領的人，把天下交給他管。這就是所謂「禪讓說」。一定要先有了墨子的尚賢主義，然後會發生堯、舜的禪讓故事。這些故事也都從墨家中流傳到儒家，而我們小時就在四書中熟讀，認爲至真至實的古代史了。

不過，儒家究竟和墨家不同。墨家講兼愛，儒家則講親親。墨家主張澈底尚賢，儒家還要保全貴族的世祿。所以從墨家的平等眼光看來，除了舉賢無第二法；從儒家的等差眼光看來，傳子比了舉賢還重要。因此，禪讓的故事，儒家雖因時勢的鼓盪而不得不受，但總想改變其意義。這一個苦衷，我們若小心讀孟子就可明白。

當禪讓說極盛的時候，燕王噲聽得着了迷，一心想追蹤堯舜，就把國政完全交給他的相子之。有人對他說：「禹本來是傳天下與益的，但因他的兒子啓在政治上也有權力，啓糾集黨羽攻益，把天

下奪回來了。照這樣看，禹在表面上傳天下於益，其實是令啓自己奪取。現在你雖把國家交給子之，然而官吏大都是太子手下的人，實在還是太子用事呵！燕王噲是真心效法堯、舜的，就把官員的印一起收了，交給子之，由他任用。子之南面行王事，燕王噲反做了他的臣。這樣三年，燕國大亂，將軍市被和太子平合謀，起兵攻子之；齊宣王又從外邊打進去，把子之打掉，燕王噲也死了。（事見戰國策、燕策一及史記、燕世家）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故事之下的大犧牲。當燕國亂時，有人詢問孟子的意見，他答道：「子之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則可乎！」（公孫丑下）以一個「言必稱堯、舜」的人而對於熱心模仿堯、舜的子噲，子之反持這種冷酷的態度，實在令人無從索解。倘使他用了同樣的句法，說「堯不得以天下與舜，舜不得受天下於堯」，禪讓的偶像豈不是就此打碎了嗎？

有一次，萬章問他：「堯把天下傳給舜，有這件事嗎？」他用了批評燕事的態度回答道：「沒有，天子是不能把天下送給別人的。」話說得這樣斬釘截鐵，當然把這件故事推翻了。於是萬章再問道：「舜的天下是誰給他的呢？」他回答一句空洞的話：「是天給他的。」萬章這人真利害，又反問他一句道：「天把天下給他的時候是明明白白的對他說話嗎？」這話要是問在西周時，那時的人當然回答說，是的，因為大雅裏就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以及「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皇矣）等句，天和入直接談話的事是很尋常

的。但孟子的時代和他的學說已不容他這樣神道設教了，所以他答說：「天是不說話的，但借了人事來表現他的意思而已。」萬章再逼進一層，說：「怎麼借了人事來表現呢？」問到這樣，他再沒有什麼辦法，只得用了墨子的手段杜造出一段故事來，說道：「舜相堯有二十八年之久，這是天意。堯崩，三年之喪完了，舜避到南河的南面，好讓堯子繼承了天子之位，然而朝覲的諸侯不到堯子那邊去而到舜這邊來，打官司的也不到堯子那邊去而到舜這邊來，歌頌功德的又不歌堯子而歌舜。舜被臣民愛戴到這樣，他不做天子也不成了。這就是從人事上表現的天意！」（萬章上）這些話雖然講的是堯、舜，其實是針對燕王噲的讓國說的。倘使子之能相子噲二十餘年，噲死之後他也離去燕都，燕的臣民也不戴太子平而戴他，那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禪讓了。然而這和堯典所謂「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諸文能相合嗎？堯典中分明說堯直接讓位於舜，而孟子偏說舜是由臣民擁戴起來的，與堯無干，這不够矛盾嗎？這樣看來，孟子所說的是儒家的堯、舜，而堯典所記的竟是墨家的堯、舜了！

豈但孟子反對禪讓，荀子的態度更要激烈。他在正論篇裏大聲疾呼道：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

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向）無以異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

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他的話說得何等決絕，徑斷禪讓說是「虛言」，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比了孟子一方面說唐虞不是禪，一方面又說「唐虞禪」的扭捏捏、藏藏躲躲的態度，高明了多少？再拿荀子的話來和堯典比較，則「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豈不是「老衰而擅」；「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豈不是「死而擅之」；而「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豈不是「堯、舜擅讓」呢？堯典所言竟沒有一句不是荀子所反對的。堪笑後世讀書人都自居於儒家，而對於孟、荀二大師之說似乎不曾看見，確認禪讓是唐虞之事，這是粗心

呢，還是不敢提出這問題呢？

孟、荀二氏都不願意聽禪讓之說，然而想不到從根本上解決，所以他們的反對不能成功。倘使他們能找出這傳說的源頭，說「這是墨家爲了宣傳主義而造出來的，我們儒家不該盲從」，豈不就連根剷去了？推求他們所以不說這話的理由，就因爲他們沒有歷史觀念，自身又被包圍於這樣的空氣之中，所以雖覺得這些話不對，而竟找不出辨偽的方法來。

由墨家的主義下所造成的故事，除此之外，可以推測的還有二端。

其一，「命」本是古人所最信仰的，到墨子始因激厲人們奮鬥的勇氣，主張非命。但現在尚書中，湯誓載桀之言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西伯戡黎載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那麼，這兩位亡國之君都是主張信命而被人打倒的。固然這也許是周代史官的垂誡之作，但也大有從非命之說出來的可能。看非命上篇說：「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厥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乃曰：『吾民有命』，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可見他確把桀、紂當做定命論者的偶像，而作爲他的攻擊的目標的。

其二，墨子提倡尚賢，又注重實利與節儉，所以他把各種器物都定爲聖人或聖王所作，見得當時創造的艱難，現在使用的人應當